

民初「文化遗民」研究

■ 罗惠缙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民初『文化遗民』研究

罗惠缙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初“文化遗民”研究/罗惠缙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307-08897-9

I. 民… II. 罗… III. 文人—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9442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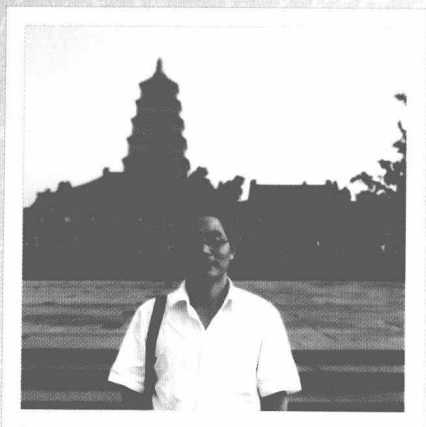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16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897-9/K · 458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罗惠缙，1968年8月生，湖南省隆回县人。先后就读于邵阳师专、贵州师范大学、武汉大学，2007年获博士学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明、清、近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科研课题1项，完成省级科研课题3项。在《光明日报》、《武汉大学学报》、《孔子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内容提要

民初遗民是中国遗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历代遗民，民初遗民除具备通常的不仕两朝、强烈的怀念前朝等遗民形态、意识外，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学术的依附力、自觉性和延续性，他们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故民初遗民呈现明显的“文化遗民”特征。

本书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总体探讨民初“文化遗民”的基本情况及其学术成就，下编选择最具“文化遗民”代表性的王国维、刘声木、章梈等作为个案研究。

民初“文化遗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一翼，他们在精神气质、理性、价值观等文化心理层面，坚守三大观念、君主制度、皇帝等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传统性内容。历代遗民面临着“亡国”问题，而民初遗民更多的是面临“亡天下”的问题，但民初“文化遗民”并没有在“亡天下”的背景中失去文化自觉和文化重振的信心，他们冷静地坚守着遗民精神和文化价值，看护着民族精神家园，这就是研究民初“文化遗民”的价值之所在。

序

冯天瑜

中国是一个讲究忠节的国度。忠臣、节士向来是国人的楷模。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国度，早在三千多年前，商汤除夏桀、周武灭殷纣，即高张“革命”旗帜，《易传》曾论证其正义性：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①

将革除暴君王命、建立新朝，诠释成上顺天意、下应人心的合理行为，故在改朝换代之际，前朝人士投效新朝，被视作“识时务”的“俊杰”。然而，在改朝换代过程中，总有一些不仕两朝、尽节于前朝的人物，如“不食周粟”的殷臣伯夷，此即所谓“遗民”。在中国文化统绪里，“遗民”往往赢得“节操可风”的赞誉，不仅在士林内被尊仰，也往往被后朝的帝王所推崇，希望本朝士子像遗民忠于前朝那样忠于本朝。当然，由于中国文化中又有“革命正义”的传统，遗民也常被批评为“愚忠”，被视作不善通变的迂腐之人。总之，遗民在中国传统的评价系统中状态复杂。而且，各个时期的“遗民”各有特定的内涵，不可一概而论，如明初的方孝孺坚守正统观，守忠节于建文帝，至死不从“篡夺”的永乐皇帝；明末清初的遗民（如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王夫之等）除不愿背弃朱明之外，还怀抱“夷夏之大防”的信念，拒绝向入主中原的满洲统治者效忠，辛亥革命前后鼓吹“排满革命”的志

^① 《易·革》。

士特别推许王夫之等前明遗民。

罗惠缙博士研究的民初遗民，是中国历史上别具一格的遗民群体，有其特别的生成机制和时代特色，概言之，由于辛亥革命推翻的不单是清王朝，而且结束了沿袭两千多年的宗法帝制，故在继清而起的民国生活的前清遗老遗少，追怀的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前朝（清朝），还包括整个宗法帝制，以及与之相为表里的传统文化。因此，身处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当口，民初遗民除具备不仕两朝、怀念前朝的遗民的通常属性外，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之道统的承袭与学统的坚守，他们对逊清的追怀，很大程度上交织着对清学（以及由清学所包蕴的整个传统学术）的追怀，故其“怀清”与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传统学术整理融为一体，从而呈现明显的“文化遗民”特征。惠缙君攻读博士期间，曾与我反复探讨民初遗民的此一特色，并竭其心力于民初文化遗民的考析，《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便是惠缙君努力的结晶。

论著由上、下两编构成。

上编总体探讨民初“文化遗民”的基本情况，包括：遗民的构成、人物关系；遗民的生存方式和与传统政治观念的关联；民初“文化遗民”的学术成就；民初“文化遗民”的文学思想及文学成就；《清史稿》及地方史志、丛书的编纂、辑录，学校教育及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等方面。

下编对王国维、刘声木、章梲等个案进行研究。王国维学殖深广，最具“文化遗民”的代表性；刘声木终身以著述为业，喜在撰述中蕴含微言大义；章梲基本以史学家身份出现，但他的诗文创作成果颇丰，文化遗民特征亦十分明显。

余论及结语部分是对民初“文化遗民”的评价。民初“文化遗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一翼，他们在精神气质、理性、价值观等文化心理层面，坚守君主制度、皇帝等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传统性内容。历代遗民面临着“亡国”问题，而民初遗民更多的是面临“亡天下”的问题，但民初“文化遗民”并没有在“亡天下”的背景中失去文化自觉和文化重振的信心，他们冷静地坚守着遗民精神，看护着民族精神家园，做出了可观的

文化贡献。

惠缙是著，将民初“文化遗民”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综合的、专题的研究，其关于“文化遗民”概念的界定，民初遗民群体关系的分析，民初遗民的学术倾向、文学活动，在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背景下的文化活动，皆有考订论析。是著在史料开拓方面也颇下功夫，一是发掘鲜为人知的材料，如王国维、沈曾植、孙德谦等1922年编纂的《亚洲学术杂志》，周庆云的“晨风庐丛刊”（包括《晨风庐唱和诗存》、《晨风庐唱和诗续集》、《淞滨吟社集》、《甲乙消寒集》、《壬癸消寒集》等），高翀的《希社丛编》；二是关注新近出版的资料，如《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民国诗集丛刊》及民国笔记史料丛刊等。此外，个人的文集、日记、碑刻、年谱、后人辑录的回忆录、文史资料等人物研究的常见史料亦有较多的运用。上述史料的运用，有助于对民初“文化遗民”的学术文化活动及其文化价值观做深入的探讨，推进了若干具体问题的研究。

是著除使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外，较多地注意到文化生态理论、文化心理学理论、现代性理论，在“遗民文学”研究中则运用“诗文互证”、“以诗证史”等方法。

惠缙君是著颇有创获，堪称佳作，已如上述。当然，是著也留下未竟论题，略举两端：（一）清民交替之际的“清帝优待条例”，于1912年以降的十多年间保留了紫禁城内的小朝廷，这无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存在上，都为逊清遗民提供了生存空间与精神依凭（王国维等行走于紫禁城，成为“帝师”，正当此际），故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溥仪等逐出紫禁城，遗民如丧考妣。对此一环节似应作较充分的论述，以昭显逊清遗民的特别境遇与心态。（二）王国维等人在清末新政前后迎受西方新学，在文、史、哲诸领域成为融会中西的先驱，此为近代学术史的佳话，而王氏政治上的保守性与学术上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久为人们关注而未获深解，若从文化遗民论题角度，置之古今中西文化史的背景上展开此一题目，有可能作出精当的诠释。以惠缙君的执著与勤学善思，相信今后还会在此类论题上精进不已，

为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吾等愿意继续略助微力，并乐观其成！

2011年7月25日撰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导 论	1
遗民·文化遗民·民初“文化遗民”	6
一、遗民	6
二、文化遗民	10
三、民初“文化遗民”	29

上 编

第一章 民初“文化遗民”概说	35
第一节 社会场景	35
一、政治背景	36
二、文化背景	38
三、身份确立——“边缘人”的文化解析	40
第二节 遗民构成	44
一、遗民谱录	44
二、地域分布	47
三、群体关系	52
第二章 遗民的政治情结	66
第一节 “孤露遗臣”之情怀	66
一、复辟情结	67
二、留辫、易服与归隐	71
三、变名	75
四、筑室	77

五、殉节	80
六、崇陵情结	88
第二节 “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94
一、拒用民国年号	94
二、诅咒民国、民国肇造者及临难变节者	98
三、拒绝与民国合作	99
第三节 民初遗民与传统观念	100
一、夷夏观念	100
二、五伦观念	103
三、孔教运动与孔教观	105
第三章 遗民与中西文化	111
第一节 传统学术的殿军	111
一、经学领域	113
二、史学领域	116
三、诸子学领域	120
四、文学领域	122
第二节 民初“文化遗民”与西学的粘连	129
一、变易与不易	131
二、器变与道变	135
三、注重学会、舆论和学校教育	136
四、政治改良	138
第三节 民初遗民文化价值观的集中表达	140
一、杂志简介	140
二、章程及争议	142
三、从杂志看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	145
第四节 “文化遗民”群体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	153
第四章 遗民与文学	156
第一节 “晨风庐”遗民文学活动	160
一、周庆云与遗民文学	161

二、“晨风庐”遗民诗歌倾向	170
第二节 其他社群与社团	194
第三节 关于民初遗民文学的认识	205
一、民初遗民文学认识的起点	205
二、从钱著和汪著看民初遗民文学的成就	207
第五章 遗民的史学及文化业绩	211
第一节 从《清史稿》到地方史志之编纂	211
一、从《清史稿》的修纂看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	211
二、民初遗民与续修《四库全书》	221
三、民初遗民与地方史志	224
第二节 从“嘉业堂”到民初丛书	228
一、遗民藏书家简介	228
二、民初丛书	232
第三节 文化教育事业	234
一、学校教育	234
二、图书馆、博物馆事业	238

下 编

第一章 王国维	247
第一节 旧时代的“新民”	247
一、“顺民”	247
二、“新民”	248
第二节 新时代的遗民	251
第三节 保守与新变：文化遗民	254
一、敦守君臣纲纪	254
二、肯认传统文化道德	256
三、借学术以经世，以赅续学术思想为职志	257
四、追求学术独立	261
五、学术理路的开拓	265

第二章 刘声木	268
第一节 变名、筑室	268
第二节 称颂遗民	269
第三节 称颂纲常节义	274
第四节 存文和撰述	279
第三章 章梈	282
第一节 作为清国史臣的史籍编纂	282
第二节 作为遗民的史籍撰述	284
第三节 尊崇孔子，任尊孔文社编辑之聘	290
第四节 诗文创作的文化遗民倾向	294
余 论：民初“文化遗民”与文化保守主义	303
第一节 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304
一、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	304
二、民初“文化遗民”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关联	308
第二节 现代性视野中的民初文化遗民定位	312
一、现代与现代性观照下的民初文化遗民	312
二、传统与现代之于民初文化遗民	317
结 语	322
参考文献	326
后 记	340

导 论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北京积水潭清脆的一声水响，打破了京城清晨的宁静，任职民国政府民政部的梁济，怀揣着一封绝命书自沉于湖中！

梁济投湖时清脆的水响瞬间即逝，飘荡在湖中的波纹和涟漪却漫过了湖堤，穿越高墙红瓦的阻隔，撞击着世间每一个人的心弦，《申报》、《顺天日报》、《时报》等各大报刊迅速报道了这条爆炸性的消息，梁济的自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一时间，赞成者有之，痛批者有之，效法者有之。溥仪谥“贞端”；梁的周姓同乡，继梁以死；第二天，蒙古人、理藩院员外郎吴宝训（字梓箴）亦投净业湖死；罗振玉也十分钦敬梁济的志节……

人们不禁要问，梁济们为何而死？

梁济留下遗书，敬告世人：“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吾因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①

梁济又说：“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

^① 梁济《敬告世人书》，梁焕鼎、梁焕鼎《桂林梁先生（济）遗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2页。该丛刊分为正编、续编、三编，出版时间跨度大，恕不一一注明年份。

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①

梁济的话似乎有点矛盾：既云殉清，却不以清朝为本位。

细细剖析梁济的话语，约可看出其矛盾之所在：既要殉清，又要殉“先圣之诗礼纲常”、“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世道”、“责任”、“本位”、“主义”、“义”等。殉清是因为他是清朝人，“诗礼纲常”、“遗传与教训”、“世道”、“责任”、“本位”、“主义”、“义”等不全为清朝所独有，而是为整个中国文化所拥有，故是“非以清朝为本位”。

显然，在梁济看来，清王朝与“诗礼纲常”、“主义”、“义”等密切关联，清王朝的灭亡预示着“诗礼纲常”、“主义”、“义”等的灭亡，清朝之亡也是中国文化的灭亡。梁济的殉命既是殉清王朝，也是殉“诗礼纲常”、“主义”、“义”等，梁济殉的就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清王朝！

两个月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陶履恭、陈独秀等人的批评文章，评论梁济的死。陶履恭认为，梁济的死根源于两种误谬的理想：拿清朝当做国家；以为自杀可以唤醒世人。显然，陶氏认为梁济的死不值一提。陈独秀则认为，梁济“就是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堕落”^②。虽然梁济的思想古旧，但是他为救济社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身殉自己的主义，主张一致、言行相符等气概，少有的正直和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还是很值得人们尊敬的。他区分了梁济的殉清和殉精神之间的不同。

约80年后，还有一批思想史家对梁济的死争论不休，他们认为梁济或死于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或死于民初信仰危机，或是遗老

^① 梁济《敬告世人书》，梁焕鼎、梁焕鼎《桂林梁先生（济）遗书》，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4～85页。

^② 陈独秀《论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

文化的心态的体现,^①等等。

就在人们对梁济自尽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淡忘时,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怀揣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自沉昆明湖。

王国维的死因是个“世纪之谜”,几十年中形成了“殉清”说、“殉文化信念”说、“罗振玉逼债”说、“性格悲剧”说等各种不同的观点。

历史上的惊人相似,把本来无亲无故的王国维和梁济拉到了一起,正如有的人说:“梁济、王国维之死,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绝唱。”^②因为都是投水自尽,他们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学人和文人们谈论的对象。

评说王国维和梁济死因的观点,有褒有贬,王、梁之死,从当事人自己到后世的评论者,都说到“殉清”,既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建立,“殉清”当属不当之举,因此,批判者的理由似乎充分。然而,细细咀嚼梁济的《敬告世人书》和熟知王国维的陈寅恪撰写的王氏挽词,我们又会发现,梁、王二人的死无不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某种危机和历史使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理解,导引出陈寅恪等人的“殉文化信念”诠释。

对于王国维的死,陈寅恪在超越“殉清”俗说的基础上,独出心裁地提出了“殉文化信念”的观点:“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

^① 相关论述文章,见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韩华《梁济自沉与民初信仰危机》,《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邵盈午《从梁济“自沉”看中国近代遗老的文化心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② 黄道炫《梁济和王国维:新世纪的解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4年10月。

心安而义尽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掎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疗救之局。盖今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情者也。”^①七年后陈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作序时又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②

显然，王国维的死，属于“文化托命”！

虽然陈寅恪对“流俗恩怨荣辱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但深层推敲陈寅恪的表述，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王国维没有“殉清”的意味：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的时期，正是“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的晚清时期；劫尽变穷的时期，正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与之共命而同尽的时期，因此，王国维所殉的“文化”和所生活的清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国维所殉的“文化信念”也含有清文化的一部分。

细细品味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梁、王二人之死的各种论述以及相关争论，它们无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梁济、王国维等既属清朝的遗民，又属文化价值被凌逼时坚守文化信念的人，他们是合殉命和殉中国文化为一体的“文化遗民”！

1901年，梁启超以其敏锐的观察、常带感情的笔调，撰写了《过渡时代论》一文，他开篇即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梁启超认为过渡时代的中国人有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

^①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学衡》第64期，1928年7月。

^②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219页。